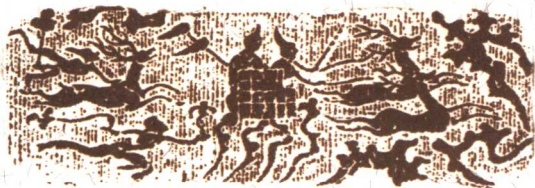


学 | 术 | 史 | 丛 | 书

陈平原 主编

中国文学研究 现代化进程二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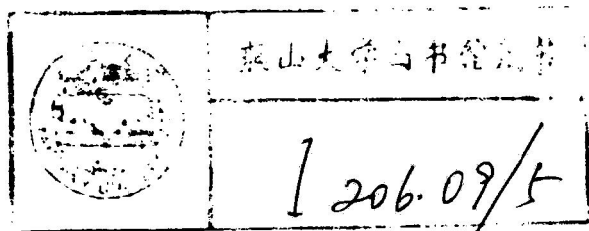
学 术 史 丛 书

陈平原 主编

中国文学研究 现代化进程二编



05



0341101

北京大学出版社

05
10
1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二编/陈平原主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4

(学术史丛书)

ISBN 7-301-04779-7

I. 中… II. 陈… III. 文学批评史-中国 IV. I206.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07521 号

书 名: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二编

著作责任者:陈平原 主编

责任编辑:张凤珠

标准书号:ISBN 7-301-04779-7/I·0565

出版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网 址:<http://cbs.pku.edu.cn> 电子信箱:zpup@pup.pku.edu.cn

电 话:出版部 62754962 发行部 62754140 编辑部 62752025

排 版 者:北京军峰公司

印 刷 者:北京大学印刷厂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890mm × 1240mm A5 开本 16.125 印张 465 千字

2002 年 4 月第 1 版 200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6.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学术史丛书”总序

陈平原

所谓学术史研究,说简单点,不外“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通过评判高下、辨别良莠、叙述师承、剖析潮流,让后学了解一代学术发展的脉络与走向,鼓励和引导其尽快进入某一学术传统,免去许多暗中摸索的工夫——此乃学术史的基本功用。至于压在纸背的“补偏救弊”、“推陈出新”等良苦用心,反倒不必刻意强调。因为,当你努力体贴、描述和评判某一学术进程时,已有意无意地凸显了自家的文化理想及学术追求。

其实,此举并非今人的独创。起码黄宗羲的《明儒学案》、江藩的《国朝汉学师承记》已着先鞭,更不要说梁启超、钱穆各自独立完成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至于国外,同类著述也并不少见,单以近年译成中文的为例,便有古奇的《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丹尼尔的《考古学一百五十年》、尼古拉耶夫等的《俄国文艺学史》、勒高夫等的《新史学》,以及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等。

即使如此,90年代中国学人之热中于谈论“学术史”,依然大有深意。一如黄宗羲之谈“明儒”、梁启超之谈“清学”,今日之大谈学术史,也是基于继往开来的自我定位。意识到学术嬗变的契

机,希望借“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来获得方向感,并解决自身的困惑,这一研究策略,使得首先进入视野的,必定是与之血肉相连的“二十世纪中国学术”。

当初梁启超撰写《清代学术概论》,只是其拟想中的《中国学术史》之第五种;今人之谈论“学术史”,自然也不会以“二十世纪”自限。本丛书不只要求打通古今,更希望兼及中外——当然,这指的是丛书范围,而不是著述体例。

无论是追溯学科之形成,分析理论框架之建构,还是评价具体的名家名著、学派体系,都无法脱离其所处时代的思想文化潮流。在这个意义上,学术史与思想史、文化史确实颇多牵连。不只是外部环境的共同制约,更有内在理路的相互交织。想象学术史研究可以关起门来,“就学问谈学问”,既不现实,也不可取。

正因如此,本丛书不问“家法”迥异、“门户”对立,也淡漠“学科”的边界与“方法”的分歧,只要是眼界开阔且论证严密的学术以及思想史、文化史方面的著述,均可入选。也许,话应该倒过来说:欢迎有志于通过触摸历史、感受传统、反省学科进而重建中国学术的学人,加盟此项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文化工程”。

1998年8月4日

目 录

“学术史丛书”总序·····	陈平原(1)
刘师培文学观的学术资源与论争背景·····	王 风(1)
一 从阮元到刘师培·····	(1)
二 章刘之争(上)·····	(8)
三 章刘之争(下)·····	(16)
四 从刘师培到周作人·····	(26)
黄侃《文心雕龙札记》的学术渊源·····	周勳初(33)
一 《札记》产生的时代背景·····	(33)
二 文学观念与师承的关系·····	(34)
三 对齐梁文学与《文选序》的不同评价·····	(39)
四 批判“褊隘者流”及阴阳刚柔之说·····	(42)
五 反对文以载道,提倡自然为文·····	(44)
六 学有本源与追本溯源·····	(47)
顾颉刚与现代民间文学·····	陈泳超(50)
一 “求真”与“致用”·····	(50)
二 《古史辨》与神话传说研究·····	(58)
三 孟姜女故事研究·····	(71)
四 歌谣研究·····	(78)
朱东润的学术道路·····	李祥年(89)
一 特殊的学术背景·····	(89)
二 文史研究·····	(94)
三 传记文学家的朱东润·····	(111)
任中敏和他所建立的散曲学、唐代文艺学·····	王小盾 李昌集(126)
一 近代散曲学的奠基人·····	(127)
二 唐代文艺学·····	(137)

三 任中敏的学术风格	(146)
罗根泽在三大学术领域中的开拓	周勳初 (150)
一 诸子学领域中的开拓	(151)
二 中国文学批评史领域中的开拓	(159)
三 中国文学史领域中的开拓	(166)
四 一点思考	(170)
戏剧史家周贻白	郭英德 (177)
一 从艺人到史家	(177)
二 发凡起例	(184)
三 本源与流变	(192)
四 民间与宫廷	(196)
阿英与晚清通俗文艺研究	陈泳超 (205)
一 藏书与史料编写	(205)
二 关于《晚清小说史》	(209)
三 对于其他通俗文艺的研究	(215)
唐圭璋词学研究的体系、方法与贡献	王兆鹏 (221)
一 词体	(221)
二 词作	(226)
三 词人	(238)
四 词史	(239)
五 词论	(241)
六 词学史	(245)
刘大杰文学史研究的成就和教训	董乃斌 (247)
一 引言	(247)
二 创作和翻译:早期的学术准备	(251)
三 现代性学术品格之养成	(256)
四 文学史撰著的一座丰碑	(263)
五 两次基本向上的修改	(270)
六 学者的困厄呼唤学术的现代化	(279)
钱钟书的文学研究和方法论	周振甫 (287)

一 钱钟书论修辞	(289)
二 钱钟书论创作	(294)
三 钱钟书论鉴赏	(306)
四 钱钟书方法论	(315)
诗性与理性的完美结合:林庚的古代文学研究	葛晓音(319)
一 楚辞研究	(322)
二 唐诗研究	(328)
三 明清小说研究与中国文学史	(334)
程千帆的诗学研究	张伯伟(343)
一 家学与师承	(343)
二 诗学研究方法	(350)
三 影响和地位	(365)
唐弢的现代文学研究	樊 骏(370)
一 走向学术研究的路	(370)
二 从搜集、整理文学史料入手	(380)
三 “要紧的是‘言之有物’”	(387)
四 “艺术感觉极好”	(393)
五 “史识”种种	(399)
六 艰难的学术跋涉	(406)
批评家李长之	于天池(421)
一 李长之对中国古典文学的批评	(422)
二 李长之对现当代文学的批评	(437)
三 鲁迅批判及其他	(451)
作为文学史家的王瑶	孙玉石(468)
一 人生理想与学术观念的最佳选择	(468)
二 文学史研究科学方法论的探索与实践	(473)
三 现代文学史研究现代化的思考与追求	(484)
后 记	陈平原(505)

刘师培文学观的学术资源与论争背景

王 风

- 从阮元到刘师培
- 章刘之争(上)
- 章刘之争(下)
- 从刘师培到周作人

一 从阮元到刘师培

1905年初,国学保存会在上海成立,随后,《国粹学报》开始发行,“国粹派”由此形成。^①

国学保存会和《国粹学报》创立时,章太炎尚在狱中,不可能参与。这一会一刊是邓实黄节与刘师培两支力量汇合的产物,^②潘博在《国粹学报叙》中说:“友人邓君秋枚刘君申叔因创为此报,欲以保全吾国一线之学。”^③正是当时的实际情况。刘师培虽只二十出头,但已拥

① 邓实《国学保存会小集叙》曰:“粤以甲辰季冬之月,同人设国学保存会于黄浦江上。”依此推算,当在1905年1、2月间。《国粹学报》创刊于光绪三十一年正月,即1905年2月。上引见《国粹学报》第一年第一号。

② 邓实当时主编《政艺通报》,但极少刊发章刘的作品,说明他们之间没什么交往。《政艺通报》甲辰第一号(1904年3月1日)上有黄节《国粹学社发起辞》,第十一号(1904年7月27日)上有黄节《国学报叙》,可见“国学保存会”和《国粹学报》源于邓黄的设想。此后刘师培的文章大量出现在《政艺通报》上,是两股力量汇合的信号。

③ 《国粹学报》第一年第一号。

有很高的学术声望,再加上邓实良好的经营能力,《国粹学报》迅速获得学术地位和商业成功。^①而刘师培质量高的撰述显然成为该报主体,在头一年半(前十八期)中,刘师培的作品高达半数,并且是几个主要栏目的核心。^②可以说,在《国粹学报》的初始阶段,刘师培起着主导其学术倾向的作用。

《国粹学报发刊辞》对每个栏目都做了说明,“撰文篇第五”曰:

一为文人,固无足观。立言不朽,舍文曷传。古曰文言,出语有章。昭明文选,巨编煌煌。大雅不作,旁杂侏僂。堕地斯文,孰振厥衰。^③

不管此文的作者是刘师培还是邓实,^④这些论点都来自刘师培的主张,崇尚文言、标举《文选》、排斥外来语,可以说就是当时刘师培的文学观。

在《国粹学报》创刊后的一年半中,这一栏目也确实成了刘师培文论的天下,其间有《文章源始》(第一期)、《论文杂记》(第一至十期)、《文说》(第十一至十五期),刊载从未间断,另外在“学篇”中还有《文章学史叙》(第五期)、《南北文学不同论》(第九期)。“文篇”中的其他文论,如田北湖《论文章源流》(第二至六期)、钱博《说文》(第十二期)、陆绍明《文谱》(第十五期)、罗惇融《文学源流》(第十六至二十

① 该报第一年第五号《国粹学报第一二三四号再版出版广告》:“本报初印三千册,一时将近售罄,顷已再版。”第一年第十号《本馆广告》:“销数已达五千余份。”在当时,这是相当可观的数字。

② 《国粹学报》设有社说、政篇、史篇、学篇、文篇、丛谈、撰录七个栏目,初创时各栏目均有中心作者,“社说”为邓实、“政篇”为马叙伦、“史篇”为黄节、“学篇”“文篇”“丛谈”为刘师培。

③ 《国粹学报》第一年第一号。

④ 此文未署作者名,郑师渠《晚清国粹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5月版)指实为邓实(该书109页),不知何据。实则此文观点全是刘师培的,但邓实当时学术倾向受刘师培左右,比较第一期中二人文章即可明了,故二人均可能是作者。

一期)等,立论都与刘师培相近,^①大体不脱《发刊辞》的要求,因而此时的《国粹学报》成了骈文派的阵地。

骈散之争是19世纪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线索,骈散之争的背景主要是汉学家和古文家之争,其核心则是阮元和桐城派之争。

程朱理学是清朝的官方意识形态,但到乾嘉年间,汉学发达,“精研故训”的结果很自然冲击了朱熹对经典的解释。一方面是对僵硬的官方意识形态的讨厌,一方面是对宋儒经典训释的轻蔑,汉学家对程朱理学一般都没什么好感。^②而同样在乾嘉年间形成壮大的桐城派“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在韩欧之间”,^③以“韩欧”为“文统”的同时以“程朱”为“道统”,由此和汉学家形成学术思想上的对立。^④与此相关,汉学家对桐城文也不会有什么好颜色。

由于对抗的是官方意识形态,关于“道统”方面的斗争其实相当曲折隐晦。^⑤至于“文统”,汉学家们的表述就相当露骨,钱大昕讥刺

① 如田文称:“文生于联珠之字,成于骈峙之体,舍兹排偶,是谓不文。”这是典型的骈文派观点;陆文称:“古今文体,骈俪为宗……古今文格……要亦不外乎骈散而更偏重于骈文者矣。”主张调和骈散但以骈为主;罗文称:“文学由简趋繁,由疏趋密,由朴而趋华,自然之理也。”又说:“至于《易》著《文言》,词尚整饰;《书》重典故,尤多叶韵。”则已是直接引用阮元的说法;至于钱博的“以训词为根柢,以文言为采饰”,更可以看做是对刘师培文学观的概括。

② 汉学家对程朱理学的直接冲击开始于戴震《孟子字义疏证》,此后有阮元《性命古训》、焦循《孟子正义》等(参看张舜徽《清代扬州学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另外,余嘉锡先生精彩地指出了纪昀对朱熹的“深恶”,见《四库提要辨证序》并参看该书有关条目(《四库提要辨证》,中华书局1980年版)。

③ 王兆符《望溪文集序》引方苞语,《望溪文集》,咸丰桐城戴钧衡味经山馆刻本。

④ 有关汉学家和桐城派间的斗争,可参看朱维铮《汉学与反汉学》(见《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此文论列精到,惟时有诛心之议。

⑤ 如阮元奉旨修《国史儒林传》,在《拟儒林传序》中区分“师”、“儒”,以宋学为“师”,以汉学为“儒”,谓二者互补,不可偏废。表面上为执中之论,暗中则是拔高汉学,将之置于与官方学说平等的地位。所以方东树在《汉学商兑》卷上论及该文时,非常恶意指出:“惜乎阮氏之言若彼而其志业表章仍宗汉学一派。”(光绪十年刻本)后之论者多以为阮元调停汉宋,所见不免皮毛。

桐城之“以古文为时文，却以时文为古文”，^① 可谓谑而虐；而戴震强调“考核”的重要性，目标当然也是桐城派疏于考证的空言“理义”和“事于文章”的“等而末之”。^② 另一方面，汉学家们主张“义理文章未有不由考核而得”，^③ 由此推出“以经为文”的佳善就顺理成章了，^④ 以至焦循说：“文莫重于注经。”^⑤ 这种“质言观”在汉学家文论中居于主要地位，也可说是经师本色，自然如此。

汉学家们的“质言说”大多散见，不成体系，这种局面在阮元手里有了改变。所不同的是，阮元论文并不主“质言”，而是依托六朝学术背景，由“文笔论”推出“文言说”，成为汉学家文论中的另一个系统。

阮元这方面的文章有《文言说》、《文韵说》、《书梁昭明太子文选序后》、《与友人论古文书》等。阮氏文论的背景是《文选序》，这除了《文选》与扬州的特殊关系外，^⑥ 昭明太子经、子、史、文的四分法确实也提供了理论上的方便，所谓“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方可称“文”；^⑦ 另外，《文心雕龙》以及当时史书和其他著作中关于“文”、“笔”的区分提供了另一个理论支持，所谓“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⑧ 二者的结合就是阮元的定义：“凡文者，在声为宫商，在色为翰藻。”^⑨ 其来源分别是《文心雕龙·总术》和《文选序》。

与前辈们一样，阮元论文的目的也在于反桐城，此自是不待明眼人而自明。他区分“文笔”，是要立骈文的“文统”来反从唐宋八大家

① 此为大昕屡引之王澍讥方苞语，见《跋方望溪文》等，《潜研堂文集》，商务印书馆 1922 年版。

② 《与方希原书》，《戴东原集》，光绪甲申刻本。

③ 段玉裁《戴东原集序》，见《戴东原集》。

④ 钱大昕《味经窝类稿序》，见《潜研堂集》。

⑤ 焦循《与王钦莱论文书》，《雕菰集》，道光四年仪征阮亭刻本。

⑥ 当时扬州学人对两件事特别自豪：一是五代北宋时治《说文解字》的徐铉、徐锴是扬州人；二是隋朝江都人曹宪以《文选》授诸生，同郡治此学者相继有公孙罗、李善、李邕等人。阮元、焦循、刘毓崧、梅蕴生等都曾谈及，今扬州尚有文选巷、文选楼之名。

⑦ 据中华书局 1977 年版。

⑧ 据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8 年版。

⑨ 《文韵说》，《研经室集》，四部丛刊初编本，商务印书馆 1919 年版。

到桐城派的古文“文统”，《书梁昭明太子文选序后》强调从《易·文言》到唐宋四六之文才是“文之正统”，而“韩苏诸大家”所作“非经即子、非子即史”，连“文”都称不上，^①根本没有资格将骈文“横指为八代之衰体”。最后的重点当然是落在“今人所作之古文”“乃古之笔，非古之文也”。^②就这样，桐城文被阮元以“正名”为手段在理论上给取消了：“非文者，尚不可名为文，况名之为古文乎？”^③

从阮元到刘师培，时间过了大半个世纪，刘氏传经也已四代，^④此时的文坛格局：桐城派几经数变，仍然主宰文坛；以今文学派为背景的沉博绝丽之文，从龚自珍、魏源到康有为、梁启超，声势越来越浩大，梁启超更借报章之势力，“新民体”倾倒一时；而骈文派并未因阮元的理论而声势大振，仍是不生不死的局面。此时刘师培重张乡先达的旧帜，自然有他的目的。

刘师培在学术的某些具体方面对阮元有过一些批评驳正，^⑤但文学上基本没有，只是补充扩展。阮元的主要观点，刘师培在自己的文章里都做过引证发挥，如论述“齐梁以下”“文体亦卑”，然仍不废为“文体之正宗”，^⑥严格区分理论与创作，不回避骈文也能产生实际创作问题，以防止潜在的批评将讨论领域扩大到自己的理论范畴之外，其策略就取自阮元的“文体不可谓之不卑，而文统不可谓之不

①③ 《书梁昭明太子文选序后》，《研经室集》。

② 《文韵说》，《研经室集》。

④ 仪征刘氏数世治《左传》，其事始于道光八年（1828），由申叔曾祖刘文淇（孟瞻，1789—1854）发端，中经祖父刘毓崧（伯山，1818—1867），至伯父刘寿曾（恭甫，1838—1882），绵延三代仍未完成，堪称悲壮（1959年科学出版社刊印的《春秋左传旧注疏证》即此未完成稿）。刘师培虽自号“左庵”以明志，但据郭象升言，似乎并无兴趣克竟先人之业（《左庵集笺》，《辛勤庐丛刊》第一辑，1941年闻喜叶氏刻本）。他在经部用力最勤的是《周官》。（参见陈钟凡《周礼古注集疏跋》，《刘申叔先生遗书》，1934—1936年宁武南氏铅印本）

⑤ 如《儒家出于司徒之官说》：“近世阮云台谓：通六艺者谓之儒，明道德者谓之师，汉学近于儒，宋学近于师。其说亦非”（《国粹学报》第三年第八号，1907年9月）。但此处刘师培似乎未能体察阮氏深意。参第3页注⑤。

⑥ 《文章源始》，《国粹学报》第一年第一号。

正”。^①刘师培也从未掩饰自己的理论构架来源于阮元,《文说》的“和声篇第三”和“耀采篇第四”可以说就是阮元“在声为宫商,在色为翰藻”的具体阐发,当然内容要丰富得多。

阮元的两大理论支柱之间有个明显的缝隙:即《文心雕龙》论及文笔时以有韵无韵为界,而《文选序》的标准则是“沉思”、“翰藻”,未有形式上的要求,更严重的是骈文本身就是不押韵的。

最早发现这个问题的是阮元的儿子阮福,《文韵说》就是关于这一问题的父子答问。阮元“笔以训福”曰:“梁时恒言所谓韵者,固指押脚韵,亦兼谓章句中之音韵,即古人所言之宫羽,今人所言之平仄也。”^②

阮元的说法自然有他的根据,只是六朝时有关这方面的史料本身就无法形成统一的结论,再加上《文心雕龙》所谓“韵”显然是指“押脚韵”,因而这仍然是个易遭攻击的理论缺陷,“或谓四声乃古代所传,五音特乐歌所用,文韵之说,近于拘牵”。^③

刘师培花了很大力气加固阮元理论构架中这一危险的结合部,“和声篇”几乎全部围绕于此。他利用自己湛深的小学修养,组织庞大的例证,分析“或抑扬以协律、或经纬以成章、或间句而协音、或隔章而转韵、或用韵不拘句末、或协声即在语端、或益助词以足句、或谱古调以成音”之俱为“句中之韵”,而“或掇双声之字、或采叠韵之词、或用重言、或用叠语”乃“字中之音”,并在《文心雕龙·声律》中找出另一句话:“声不失序,音以律文。”^④说明“古人之文,可诵者文也,其不可诵者笔也”。^⑤刘师培有意识地将刘勰有韵无韵的区分标准论证成可诵不可诵,以此为骈文和韵文建立了统一性。

相对于“和声篇”之为阮元“在声为宫商”作补充,“耀采篇”对阮元“在色为翰藻”的扩展则显得更为重要:

① 《书梁昭明太子文选序后》,《研经室集》。

② 《文韵说》,《研经室集》。

③⑤ 《文说·和声篇第三》,《国粹学报》第二年第一号,1906年2月。

④ 据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昔大《易》有言：“道有变动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杂故曰文。”《考工》亦有言：“青与白谓之文，白与黑谓之章。”盖伏羲画卦，即判阴阳；隶首作数，始分奇偶。一阴一阳谓之道，一奇一偶谓之文。故刚柔相错，文之重于天者也；经纬天地，文之列于溢者也。三代之时，一字数用，凡礼乐法制，威仪言辞，古籍所载，咸谓之文。是则文也者，乃英华发外秩然有章之谓也。^①

阮元文论的核心是“文言”，刘师培这里讨论的则是“文”。有关“文”的多种训释，前人都曾论及，《文心雕龙·原道》就有“天文”、“人文”的说法；^② 阮元在早年的《四六丛话序》中也曾谈及“文”的语源。^③ 但富有独创性的是，刘师培在此有意识地建立了一个相生的垂直系统，在这一体系中，“文”包括“礼乐法制、威仪言辞、古籍所载”的天地间一切“英华发外秩然有章”的事物，以语言文字为载体的“文”则是其中的一个子目，因而只有符合“英华发外秩然有章”的“偶语韵词”才可称“文”，“文笔”之间性质上的差异由此也就显得异常突出。刘师培把阮元的“文言”纳入到他所分析的“文”的统一性中，为骈文乃“文章之正宗”提供更有力的支持，^④ 这既是理论上的拓展，也是现实学术论争的需要。

和阮元一样，刘师培也面对着当时的对立文派。不过对于梁启超的所谓“东瀛文体”，刘师培似乎看不上眼，并未有什么学理上的批判，只在《论文杂记》第二则中，论述完“俗语”应与“古文”并存后，捎带说了一句“若夫矜夸奇博，取法扶桑，吾未见其为文也”，^⑤ 逐出文坛了事。

至于依然势焰遮天的桐城派，刘师培当然不会放过，不过时时提到的同时似乎也未脱阮元的理路，《文章源始》批评桐城派“以经为

①④ 《文说·耀采篇第四》，《国粹学报》第二年第二号，1906年3月。

② 据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③ 《研经室集》。

⑤ 《国粹学报》第一年第一号。

文,以子史为文”,认为骈文才是“文章正轨”,^①都是阮元曾说过的话。有所发挥的是《论文杂记》第二十二则,刘师培讥刺桐城用“辞”字不当,指出“辞”训“狱讼”,“词”才是正确的用法。^②这是小学家的长技,不过在策略上也是搬用阮元的,阮元称“籀史奇字,始称古文;至于属辞成篇,则曰文章”,^③以此说明桐城派用“古文”二字不当,刘师培则认为“辞”字也不当,于是姚鼐的名著《古文辞类纂》中所使用的“古文辞”这一名称,竟然没有一个字用对。对于汉学家的这种“咬文嚼字”,桐城派大概也只好大摇其头、三缄其口了。

就刘师培的整个文论体系而言,虽然丰富复杂,但在精密严整的同时无法掩盖大的框架上基本没有脱出阮元的范畴这一事实;而且这位“放大的阮元”似乎并未对桐城派等对立文派投入太大的精力。对于刘师培这样一位博学、骄傲、敏感的年轻大师来说,这种既无创造性又多少有点无的放矢的长篇大论实在显得有点奇怪。事实上,桐城文、新文体之类缺乏学术深度的敌对力量根本无需刘师培花这么大的力气为阮元的理论弥缝补缺,现实的挤压来自另一个实力相当对手的巨大存在,令人不可思议的是,那竟是同处一个阵营的章太炎。

二 章刘之争(上)

钱基博在总结刘师培的文学观时说:“论小学为文章之始基,以骈文实文体之正宗,本于阮元者也。”^④这两点概括可谓相当准确,

① 《文章源始》,《国粹学报》第一年第一号。

② 《国粹学报》第一年第十号,1905年11月。此则后以《古文辞辨》为题收入《左庵集》。但郭象升很反对他的说法,《左庵集笺》谓:“此篇之说不足凭,只因推翻姚氏之书,而不顾文辞二字上起左传下迄六朝,处处见之,不能一手掩却天下目也。姚氏但于文辞二字上加一古字耳。若恨此派文字,不妨攻其用古字之专擅,何乃强坐辞字为狱讼之言也。”见叶灵原编《辛勤庐丛刊》第一辑。

③ 《与友人论古文书》,《研经室集》。

④ 《现代中国文学史》,岳麓书社1986年版。

但话只说对了一半，“以骈文实文体之正宗”固然本于阮元，“论小学为文章之始基”则是汉学家文论的普遍观点，无论主张“质言”还是“文言”，无不强调小学的重要性，并非阮元所独有。恰恰相反，阮元虽也说过“古人古文小学与词赋同源共流”，^①但并未纳入他的文论体系。

与阮元不同的是，刘师培论文时动用了几乎全部的小学修养。“小学”与“文章”的关系在他那儿之所以变得如此重要，是由于对刘师培文论体系构成直接威胁的章太炎文论也导源于小学。发生在晚清的这场文学论争其战场实际上是在语言文字领域。

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是“学说万千”的时代，西方各门学科通过翻译涌入中国，由于这是一个全新的文化体系，出现了汉语词汇不敷使用的局面，尤其严复的翻译已不再是坚船利炮和天文历算，开始涉及社会科学领域，对文化界的心理冲击更加严重。章太炎、刘师培、王国维等人都曾就“造新字”和“新学语”做过非常严肃的讨论，可见这是当时文化精英们普遍关注的问题。

在《馗书·订文》中，章太炎对“以二千名与夫六万言者相角”的现实状况表现出非常深刻的文化危机感，认为“此夫中国之所以日削也”。^②在该文所附《正名略例》中，他花了很大力气讨论翻译和造字原则。

章太炎的基本立场，借用荀子的话就是“必将有循于旧名，有作于新名”。^③他认为语言文字功用不同，语言“吐言为章可也”，^④而文字则是“名实眩惑，将为之别异”。

① 《扬州隋文选楼记》，《研经室集》。按：此篇并非文论，而前举诸文中阮元未说过类似的话。

② 《订文第二十二》，《馗书》初刻本，引自《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③ 此语出自《荀子·正名》：“若有王者起，必将有循于旧名，有作于新名。”据引《荀子集解》，中华书局1988年版。

④ 《文学说例》，《新民丛报》第五、九、十五号，引自《中国近代文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